



絲綢之路

THE SILK ROAD



絲綢之路

关 蔚 然 編

文 物 出 版 社

封面题签：施 闾

封面设计：仇德虎

版式设计：彭华士

摄影：武纯展 李生材 安克仁等

翻译：何 飞

责任编辑：胡昭静

丝 绸 之 路

关蔚然 编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 13.5

统一书号：8068·1349 定价：24.50元

目 录

丝绸之路

宋晓梅

图版

西安出土唐三彩运丝骆驼俑 (图版 1)

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壁画 张骞出使西域辞别汉武帝 (“中宗”) 图 (图版 2)

敦煌莫高窟第 296 窟窟顶北披画 福田经变 (部分) (图版 3)

西安——汉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图版 4—16)

从陇西到河西走廊 (图版 17—69)

嘉峪关——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图版 34—45)

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都尉 (图版 46—53)

敦煌和敦煌艺术 (图版 54—63)

古阳关和玉门关 (图版 64—69)

天山北麓 (图版 70—129)

吐鲁番 (图版 95—129)

塔里木盆地 (图版 130—163)

库车——古龟兹 (图版 138—152)

南疆重镇喀什市 (图版 164—172)

塔克拉玛干南缘——昆仑山北麓 (图版 173—204)

帕米尔 (图版 205—217)

丝绸之路经过的国家 (图版 218—230)

附录

丝绸之路 (英文)

图版说明 (英文)

丝 绸 之 路

宋 晓 梅

(一)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亘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交通线沟通了欧、亚、非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欧洲以及非洲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

今天，这条曾为世界古代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立下丰功伟绩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丝绸之路所开拓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却日益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更加密切。新华社摄影记者对这一历史陈迹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的摄影机镜头曾被印度新德里比拉庙的雄伟建筑所吸引，曾在威尼斯大运河畔停留，拍下了养蚕房里和阆姑娘的情影，留住了巴基斯坦商人到塔什库尔干进行贸易的场面。丝绸之路的昨天是壮阔的，今天更加美好，把丝绸之路的昨天和今天呈现出来，是很久以来的想法，编辑出版这部图集，算是把这一想法付诸实现的一个开端。通过这部图集，不仅可以领略丝绸之路上的美丽风光，熟悉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还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几经沧桑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对此你会感叹不已。通过这本图集，对于她的未来，你或许会勾画出一幅更为美好的图景。

我国是丝绸的故乡。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都留下了新石器时代人们从事蚕丝生产的痕迹。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发现的蚕茧，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最早的有关蚕丝的遗物。1960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丝织品残片，直接证明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蚕丝和丝织品的生产。

殷商器物上也同样保留着丰富的有关蚕丝的记载。殷代墓葬出土的形态逼真的玉蚕，同时期青铜器上的蚕纹装饰图案以及残留在青铜器上的丝织物痕迹，都说明当时我国的丝织业较新石器时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代甲骨文中，丝、帛等象形文字的出现，更反映出丝绸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

殷代以后，丝绸生产已发展得相当普遍。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诗经》、《禹贡》等对这一时期的丝绸生产、丝织物品种及其产地分布状况都有记载。

西汉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有山东、河南、四川等几个主要的丝织品产地，西部的甘肃地区到东汉时也开始生产蚕丝。甘肃酒泉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

就有反映采桑育蚕的画面。汉代丝织品的代表作是织锦，织锦是一种多彩丝织品，需要繁复而精湛的织作工艺，它代表汉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汉代丝织技术的普遍提高。我国丝绸运往西方大约始于公元前三世纪。

西方古代文献报道中国也是由丝绸开始的。公元前五世纪初叶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最早报道东方世界的欧洲学者，他说在东方有“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1〕公元150年前后，希腊人托罗梅记述马其顿商人梅斯所派遣的代理人，从幼发拉底河到东方经商时，曾到过中国，他称中国为“赛里斯”国。〔2〕赛里斯即Seres的音译，Seres一词是由希腊语Ser演变而来的，Ser意即蚕丝，Seres即丝绸之国。中国出产的蚕丝驰名宇内，所以赛里斯便成为中国的代称。从欧洲人对中国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之间，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此后我国的丝绸才得以西传。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从汉代开始，我国同西方各国民间与官方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由于丝织业的不断发展，丝绸成为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大量丝绸辗转西运，远销到中亚、西亚、地中海东岸和罗马各地。据说中国丝绸大量流入罗马，曾造成罗马的巨额入超。在古代西方人的心目中，丝绸是十分神秘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丝绸的生产过程，以为“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3〕当时的丝绸在西方是非常贵重的衣料，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据普林尼记载，中国丝绸贩运到罗马后，“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4〕

由于中国丝绸源源西运，东西方交通得以畅通，形成了一条联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大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最初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他是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学者。此后，中外史家便相沿使用。

一般说来，丝绸之路是指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再由中亚西行至地中海沿岸城市的陆上交通大道。但有些学者认为，还有几条道路也应称为“丝绸之路”，如：

一、草原路，这条路线经过从蒙新高原到中亚的草原地带，故称之为草原路。草原路大致可分为两条。其一，出敦煌，向北至巴里坤，西行至吉木萨尔，由吉木萨尔进入天山，沿天山纵向山前的草原地带西行，直抵伊犁、伊塞克湖，转而至中亚的河中地区。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为匈奴所迫，月氏、乌孙大致就是沿这条天山草原路相继由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一带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其二，出宁夏大武口，穿过宁夏北部进入甘肃、内蒙的交界地带居延，再西北行至阿尔泰山，沿阿尔泰山西行至撒马尔罕，北上经南俄草原至黑海、地中海。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匈奴首领郅支单于，在呼韩邪单于降汉后，西迁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上的郅支城（今江布尔），就是沿阿尔泰山西行而去的。

二、海洋路，大致有三条。其一，由我国的东南沿海至东、南亚诸国，再渡印度洋，或取道波斯湾进入伊朗高原，或进亚丁湾，入红海，到地中海沿岸城市。其二，由我国沿海港口到日本。其三，由我国沿海港口出发，横渡太平洋，到印第安人的玛亚文化中心之一的墨西哥城。

可见，丝绸之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经由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中亚的陆路交通线，而广义的丝绸之路还包括游牧民族迁来徙往的草原道，以及通向中亚乃至欧洲的海上交通线。本文所介绍的是狭义的丝绸之路。

同历史上任何事物一样，丝绸之路从她形成以来，就与政治的兴衰、时代的更替休戚相关，不过，丝绸之路的存在就其实质来说，主要是靠商业方面的活动来维系的。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有巡礼传教的宗教信徒，有逐水草迁徙的游牧部落，然而商人是丝绸之路上的活跃分子，就连官方使节出使异国，也无不携带赠送馈答之物品，而所谓赠送馈答又多少带有一些商业交换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乃是一条商道。作为商道，由于沿途设馆置驿，安排食宿，供应饲料，商旅往来其间才不致被浩瀚的戈壁，无垠的沙漠，高耸的山峰和湍急的河流所阻隔。从汉武帝始，通往西域的重要商道上设置了许多驿站，“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汉书》卷九十六）唐朝在伊州（今哈密县）经北庭至碎叶（今苏联境内楚河南岸之阿克·贝希姆古城遗址）的重要交通线上（即《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碎叶道）设置驿馆，储备草料。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批数目相当可观的马料帐，这批帐目详细记录了各驿馆每日马料的供应和驿马的使用情况。敦煌壁画中的“福田经变”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古丝道驿站接待来往客商歇息食宿，给驼、马饮水喂料的场面。罗马地理学家伊西多尔撰《帕提亚驿置记》，曾详细列举了安息国（今伊朗）内大道上的驿站设置。大食（今阿拉伯）境内的呼罗珊大道上也是亭站毗连，至今尚有残迹可寻。把丝绸之路比作夜空中的银河，丝绸之路沿线的驿站恰似银河系中明亮的星座，从长安一直连接到地中海。

（二）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绚丽多彩的锦带，始自我国中原地区，穿行河西走廊，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缘，飞跨帕米尔高山，经过中亚草原，横越伊朗高原，绵亘万里，迤迤西去，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和北岸。依照丝绸之路的自然特点，可分东、中、西三个路段。

东段，指敦煌以东而言。在这一段长安、洛阳、大都三个著名古都自西向东依次座落在丝绸之路上。这三大古都曾先后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长安地处今西安市，位居关中平原的中央，依山带水，地势险要，曾是多少朝代建都的地方，其中以汉、唐时期最为兴盛。以唐代长安城为例，面积比今天的西安城

大六倍，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从长安故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文物的数量来看，不难想见当年长安的宏伟壮丽和繁荣兴盛。

长安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我国同东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枢纽。取道丝绸之路来我国的各国使节和商胡贩客，云集长安。唐朝政府在长安城西专门开辟了供各国商旅经商贸的“西市”。有些西域胡商在中国经商数十年，便在中国结婚成家，生儿养女，长期寓居。他们住在长安城内，使中国和外国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对各自的文化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刘肃在《大唐新语》中有一段饶有风趣的记载，贞观年间，长安城里有人家被胡人所盗，雍州长史杨纂遍查城中胡人，久查不获。经司马参军尹伊指出，长安城里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风气，于是决定不能只查胡人，必须兼查汉人，不久果然捕获盗贼。此例虽系小事，但也可看到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一个侧面。

宗教的传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传的宗教以佛教最为兴盛。佛教的传入，是东汉至北魏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洛阳是中亚僧人进行传教和译经活动的中心，也是佛教在中国流行的重要基地。同其他一些东传的宗教一样，佛教的传入也取道丝绸之路。相传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伊存曾口授“浮屠经”，汉明帝曾派蔡谟到印度取经。蔡谟到了印度，除学习佛法，还带回了佛经。明帝为了贮藏佛经和款待陪同前来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特在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所寺院——白马寺。在蔡谟取经之前，上层贵族地主阶级中的博学者，已掌握了有关佛教的知识。不过明帝遣使往西域求法，是我国正式引入佛教的开端。

公元518年，北魏孝明帝派宋云出使西域。宋云由洛阳出发，经过吐谷浑，沿丝绸之路南道抵达今印度境内。故洛阳也不失为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元朝于今北京地区建大都，丝绸之路的起点又东移到了北京。当时的大都城，商贾云集，货物充盈，十分繁荣。元代中国到欧洲的交通颇为发达。起初，联接我国与欧洲的交通线主要在天山以北的草原，路线大体由北京到漠北和林，沿草原道通往欧洲。成吉思汗西征时，对这条道路作了修整，但依然十分艰险。蒙古统治者从西夏手里夺取了河西走廊之后，旋即着手“置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永乐大典》卷一）从而大大便利了中原与新疆乃至欧洲的交通。丝绸之路南道，沿途早设驿站，公元1274年元朝政府下令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大规模设置驿站，丝绸之路南道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大旅行家长春真人邱处机奉诏西行，太祖十六年（公元1221年）由北京出发，沿北道西行，次年于中亚河中府晋见成吉思汗。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长春真人西游记》，详细记载了沿途各地的道里、风俗，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历史和地理的不可缺少的资料。〔5〕元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常德奉蒙哥汗之命往波斯，也经丝

绸之路北道。刘郁记录整理了这次行程，写成《西使记》，详细记载各地风土人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6〕

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哥孛罗随同父亲、叔父经丝绸之路南道到中国，公元1275年于大都朝见元世祖忽必烈。马哥孛罗甚得世祖宠用，在中国留居十七年之久。以他的经历写成的《马哥孛罗游记》是中世纪欧洲人了解东方的宝贵文献。现代欧洲的一些学者，对这部游记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它是根据波斯的某种导游手册，加上道听途说而成书的，马哥孛罗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固然，《马哥孛罗游记》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或其它不足之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马哥孛罗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况且这部游记又是由同狱难友比萨作家鲁斯梯谦所记录，难免走样和误记。因此对这部游记的真实性和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应当客观地加以评价，而不应怀疑或贬低它。

从大都经洛阳到长安，再由长安进入凉州，凉州以西便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河西四郡——武威郡（治所在今民勤东北）、张掖郡（治所在今张掖西北）、酒泉郡（治所在今酒泉）和敦煌郡（治所在今敦煌县西）构成了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

丝绸之路中段，指敦煌以西，葱岭以东而言。由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出敦煌之后，沿沙漠的南缘（即昆仑山北麓）和沙漠的北缘（即天山南麓）分别形成了两条西向的路线：出敦煌，西南行至鄯善（今若羌）、经且末（今且末县附近）、精绝（今尼雅）、扞弥（今于田县北）、于阗（今和田县）、莎车（今莎车县），自莎车往西，由塔什库尔干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地区），谓之南道；由敦煌出玉门关西北行，过白龙堆，经楼兰（今罗布淖尔西岸）、焉耆（今焉耆县附近），也可绕道车师（今吐鲁番县附近）、龟兹（今库车县附近）、姑墨（今阿克苏县）、疏勒（今疏勒县），由疏勒翻越葱岭（今帕米尔山）抵大宛（今费尔干纳地区）称作北道。为绕开行路艰险的白龙堆，西汉末年，沿天山北麓又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出敦煌，北上伊吾（今哈密县）折而西行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东且弥（今乌鲁木齐）、乌贪訾离（今玛纳斯县东），沿天山北麓往西至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康居（今撒马尔罕）抵安息。史书称之为北新道，改称原北道为中道。

自古以来，天山南北之间的交通极不便利，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穿行其间。今天，再也见不到往昔的情景，交通运输主要靠汽车和火车。吐鲁番到南疆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各族旅客从吐鲁番到库尔勒只需半日旅程即可抵达。最近，在终年积雪、山势陡峭的天山，又建成了我国第一条横贯天山的高山公路，直接沟通了南北疆之间的交通，大大便利了南北疆之间的联系。

丝绸之路西段，指葱岭以西的路程。由于所经地域地形复杂，路线较长，途中分出若干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因此，西段又分南、北两线。

南线，自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过休密（今阿富汗瓦汉）西至贵霜国的都城兰氏城（今巴里赫），由此向南至帆延（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北之巴米安）从这里进入北天竺（今巴基斯坦），顺印度河而下，可达阿拉伯海和亚丁湾，入红海，抵达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埃及亚历山大港。

北线，由康居向西，渡乌浒水（今阿姆河），西南行经伊朗境内都拉该（今德黑兰附近），自今克尔曼沙赫市附近的贝希斯越过扎格罗斯山脉，西南行至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安息都城泰西丰和与之隔河相望的希腊古城塞琉西亚（今巴格达东南）由泰西丰或塞琉西亚出发，或沿底格里斯河右岸北行，经古亚述都城尼尼微，渡河至今摩苏尔市西北行，转而西南行至地中海东岸今土耳其海港城市安塔基亚；或沿幼发拉底河右岸西北行，渡哈布尔河至内塞佛立昂（今叙利亚腊卡城）继而北行至安塔基亚。由地中海东岸的这些海港城市可抵意大利首都罗马城。

丝绸之路西段，绵延数千里，经过今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意大利、埃及等十数个国家的辽阔地区。

（三）

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的十九年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尽艰险，遍访天山南北和葱岭以西的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等地。他的西使大大开扩了西汉政府的眼界，沟通、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开辟了官方使节通行于丝绸之路的先例。外国学者评价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7〕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公允的。自张骞通西域后，人们多采用司马迁《史记》“博望凿空”的说法，把丝绸之路最早的历史与张骞西使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张骞西使之前，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与西北地区及其更西部地区有所交往。丝绸之路的源起至少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当然，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贸易的发达，则在张骞通西域之后。

作为一条商业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兴废变迁，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紧密相连。每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丝绸之路的命运。因此，丝绸之路也打上了政治历史变迁的印记。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汉朝的统治尚未获得完全巩固，经济还处在急待恢复的阶段，匈奴之患，无暇顾及。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朝政府已经平息了内部叛乱，生产日益发展，出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局面，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武帝一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抗击匈奴的力量，同时派卫青、霍去病等率军出击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匈奴浑邪

王率部众四万臣属於汉。汉朝旋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其后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汉书》卷六）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卷九十六）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了正式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进一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促进了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发展。此后，西汉王朝不断派人到西域各国进行政治和商业贸易活动，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汉书》卷六十一）

西汉末年，匈奴再度强大，重又控制了西域的一些地区，使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匈奴对西域诸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任职三十多年，曾降服鄯善，平定疏勒，并率疏勒、康居、于阗、扞弥兵攻破阻碍丝绸之路的姑墨，姑墨、龟兹等地遂自动归附于汉，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得以恢复，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抵两河流域的条支（今伊拉克境内），欲西渡地中海，但被安息船人的危言所阻，未能继续西进。当时的东汉和大秦是为东、西两大帝国，安息居其间。为了独自控制东汉和大秦间的交通贸易，安息极力阻挠两国的直接接触，以免失去自己的垄断地位。甘英虽然未抵大秦，但他是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到达西亚的使者。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丝绸之路极度繁荣的时期。唐朝初年，西突厥控制着西域地区，割据自立。太宗即位，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消灭了受西突厥可汗控制的高昌麴氏王朝，设置了西州、庭州和安西都护府等军政机构。这时，西突厥继续在西域扩展自己的势力，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灭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并拘留唐使，侵扰伊州，阻隔丝绸之路。在太宗、高宗两朝的努力下，终于摧垮了西突厥割据政权。唐朝政府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一系列政权机构，使西域及更西部地区与内地重归统一，唐王朝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得以大大发展。“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张籍的《凉州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情景：“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司业集》）安西即安西大都护府，‘初驻西州（今吐鲁番县），后驻龟兹（今库车县）。西州和龟兹不仅是军政机构所在地，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时，路经吐鲁番地区，曾在高昌城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热情接待。麴文泰专设大帐，请玄奘讲经三日。至今，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建筑依然保存得相当完整，由於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两座古城遗址及其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代墓葬中得以保存大量的历史文物。墓葬出土的文书为我们研究十六国时期的

高昌郡到唐代西州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这批文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出版，将会使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崭新的面貌。

五代十国各割据王朝相互角逐，西域地区也出现了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形成了哈拉汗王朝、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三个较大的政治势力。哈拉汗王朝统治范围包括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和新疆西部的喀什噶尔一带；于阗王国以于田为中心；高昌回鹘的地域包括吐鲁番盆地及焉耆、龟兹一带。这些政权同中原地区的政权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当北方建立辽朝，中原地区统一於宋朝时，全国范围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西域同内地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官方和民间贸易都十分发达，丝绸之路上又出现了中外商队的足迹，大批的西域商人长期在内地经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中看，沿丝绸之路进行的官方贸易，已延伸到了辽朝境内。金朝灭辽，宋朝偏安於江南，丝绸之路又一度衰落。

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后，发动西征，灭西辽，往欧洲的驿道于是畅通无阻，往来商旅，仍走丝绸之路北道。忽必烈改国号以后，元朝中央政府在新疆各地设立驿站，发展交通，丝绸之路更加活跃起来。元末明初，丝绸之路这条数千年来沟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线逐渐衰落，被日益发展的海上交通所取代。

(四)

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强了我国人民和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人民的友好关系。

张骞通西域之后，我国历代王朝不断派出使节赴中亚、西亚各国进行政治和商业贸易活动，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汉武帝派使者到安息时，安息国王令两万骑士到王城以东，数千里以外的木鹿城（今苏联土库曼马里）迎接汉朝使者，沿途城镇的人民也自动出迎。各国派来中国的使节络绎不绝，他们贡献殊方异物，瓊宝珍玩。汉朝政府对历次来使均优礼相待，“设酒池肉林，以飧四夷之客”，（《汉书·西域传》），并回赐以绮绣杂缯等丰厚的礼物。

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市场空前活跃。商业的繁荣必将引起统一货币的流通。存在於西域各地的物物交换形式，已不能适应需要，汉代流通货币开始在西域地区使用。汉代各种钱币遍于西域各地的遗址中。

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并未因政治的动乱而中断，相反，还有所发展。西晋时期，大宛国两次送来当地名产汗血马，大秦使节也到达中国。各国商人在内地经商，当时洛阳慕义里居住着包括大秦在内的西域胡商万余户，致“天下之货，咸悉在焉。”（《洛阳伽蓝记》）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发现

了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物。在苏联塔拉斯一带和品治肯特的古城遗址中，也曾发现我国中原铸造的“位至三公”铜镜、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所铸“布泉”钱等文物。

至于唐朝，市场上除了使用唐朝政府发行的货币，还流通着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和阿拉伯金币。以上货币在塔什库尔干、喀什、乌恰、吐鲁番和西安、咸阳均有出土。〔8〕在东西方贸易十分发达的唐朝，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亚的波斯商人非常活跃。粟特人自幼学习经商，享有国际商人之誉。波斯人“善贾市，争分铢”（《汉书》卷九十六），很早就是中国与大秦国的贸易中间人，以致“大秦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綌”。（《魏略·西戎传》）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物中有许多胡商的形象。如陕西礼泉昭陵出土胡人牵驼俑，那深目高鼻多发的牵驼者乃是典型的西域胡商形象的写照。

马的交易，从汉代开始，就是中国同西域地区进行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汉武帝时，乌孙西极马，大宛汗血马传入内地。伊犁河流域雨水充足，牧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培育良种马的天然牧场。古代乌孙人在这里培育出“西极马”，今天，哈萨克牧民在伊犁河畔，乌孙山下，驯养培育出的哈萨克马（又称伊犁马）有的宜於负重，有的适於骑战，是我国著名的良种马之一。

随着养马业的发展，传入了苜蓿，同时传入的还有葡萄。苜蓿是马的优良饲料，张骞通西域后，“汉使取其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相继由西域传入内地的还有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椒、葱等，这些植物，都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传入的。印度的香料、象牙、棉花、罗马的琉璃、原产波斯的胡杨树也陆续传入。

中国西传商品以丝、茶为主。丝织、造纸、印刷术医药等、先进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西方。中国丝织品经由商人西传的数量最大，不过历代封建皇帝的赏赐也是中国丝绸西传的方式之一。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来朝，宣帝一次就赏给他“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汉书》九十六）汉代丝织品在新疆地区昭苏乌孙墓葬、民丰县东汉墓和罗布淖尔汉代遗址都有出土。〔9〕南俄草原斯基泰人的墓葬里也发现中国丝织品残片〔10〕。随着丝织品的大量输往西域，继而西传的是丝织工艺，它首先传到了新疆地区。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迟在公元五世纪中叶，新疆地区已经有了丝织业。文书中见到“龟兹锦”、“疏勒锦”、“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等锦名，至少这三个地区是丝织品的产地〔11〕。这些织锦有什么特点，文书中没有详细记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出土的实物，除中原流行的平纹经锦外，还出现了斜纹纬锦。斜纹纬线起花是当地兄弟民族和中亚、西亚人民纺织的传统工艺。后来中原地区的丝织品中，也采用了这种织法。丝织品的图案花纹，兼有中原地区采用的树纹、团花纹、宝相花纹图案和波斯织物常常采用的对禽、对兽联珠纹样，这一

点在唐代丝织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率部与大食在怛罗斯交战，唐军战败，许多被俘的士兵被押往撒马尔罕，《经行记》作者杜环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保留下来的杜环的记载得知，许多出身工匠的唐朝士兵，在当地从事造纸手工业，造纸技术传播迅速，撒马尔罕从此逐渐发展成为造纸业的中心。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造纸术渐向西传，一直传到欧洲各地。大约在十世纪，印刷术传到高昌回鹘地区，吐鲁番地区曾发现大量刻印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十三世纪印刷术又传到了埃及，十五世纪欧洲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印刷术西传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丝绸之路一经开拓，随着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广泛。汉武帝时，西方的杂技是我国人民十分欢迎的节目。音乐、舞蹈等艺术流传于我国是在汉朝以后，康国乐、安国乐、胡旋舞等均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我国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的中部枢纽地带，首先有机会接受外来的艺术。新疆各族人民素以能歌善舞、热情好客著称，新疆各兄弟民族的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技艺充实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素负盛名的古代龟兹乐曾对我国的音乐产生过很大影响。隋朝制乐，采用了龟兹乐工苏祇婆所传授的源于印度的龟兹乐律“五旦七声”，勘定七调，对隋唐时期的燕乐、雅乐产生过深刻影响，（《辽史》卷五十四）在我国音乐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新疆作客，葡萄架下，毡帐篷里，维吾尔族农民和哈萨克牧民会捧出甘甜的葡萄、鲜美的奶茶请客人品尝，向来客讲述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人们打起手鼓，拨响琴弦，蹁跹起舞：“舀来天山清泉水，采来草原红玫瑰，我们用热血浇烈火，煮出的奶茶令人醉。”快乐的歌声，婀娜的舞姿，令人赏心悦目。

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东罗马的景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北魏神龟年间，祆教传入，北魏、北齐、北周并加崇祀，唐朝更为祆教置官，官名萨宝。景教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它在中国流传的情况，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有详细的记载。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于七世纪初，据说穆罕默德在世时就从海路传到了广东，很快传到内地，但它沿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却在三百年后，即公元十世纪。东传的宗教，对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的东渐，沿丝绸之路，从洛阳到拜城出现了一连串的石窟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石窟寺艺术网。仅甘肃境内，大小石窟寺就达二十余处，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金塔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庄浪云崖寺、武山拉梢寺、天水麦

积山、华亭石拱寺，泾川南石灰寺、王母宫、庆阳北石灰寺、华池保金寺、莲花寺、合水宝泉寺等。这些石窟寺象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敦煌莫高窟是其中一颗最灿烂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创建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现存最早洞窟为北魏时期开凿。此后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朝代陆续开窟，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敦煌莫高窟大批壁画和彩绘塑象是我国珍贵的艺术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艺术瑰宝。我国古代的艺术家用，继承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各种外来因素，使民族艺术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瑰丽。窟内还保存了大量从晋到宋的各种遗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的出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不仅因为它是当时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以至非洲的联系纽带，还在于它为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西行求法高僧铺设了桥梁，法显、玄奘是他们之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

法显于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30——380年）时，从长安结伴出发西行，遍游印度，巡礼佛迹，历时十四年才回到祖国，带回大量佛教经律著作。他回国后，除与人合译佛经外，又撰成《佛国记》（一称《法显传》），记述他出国旅行的见闻。这部著作对研究古代中亚、印度和南海各地地理风俗和宗教活动有重要帮助。

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三年后到达印度，先在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五年，后又周游印度全境，考察印度风俗，访问各方学者，并在曲女城说法，最后满载荣誉和友谊回到长安。他带回了梵文贝叶经五百二十夹，计六百五十七部。并译出经、论、律等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唐代还有慧超、悟空西行求法，著有《往五天竺国传》并译出《十力经》等书。西行求法高僧不仅把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带到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传布到印度和其他国家，因此可以说西行求法高僧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荣使者。

（五）

横跨数万里，纵观千余年，饱览了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历史画卷。到十三世纪下半叶，丝绸之路的光辉逐渐暗淡。忽必烈建立元朝，实行强化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一政策引起西北地区蒙古游牧贵族的反对，在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发生了海都、都哇的叛乱。海都在今阿尔泰地区、塔城地区、准噶尔盆地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撒马尔罕地区实行割据，对上述地区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给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经济造成很大破坏，给丝绸之路的交通和商业贸易造成了重重困难。十五世纪初，由于察合

台后王势力的进一步分裂，新疆和中亚地区各自割据，不相统属。为了推行伊斯兰教并控制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察合台后王开始与明朝争夺哈密。这场争夺战前后一共经历了一百三十余年。吐鲁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人民深受其害，中亚各地商人不能到内地经商，渴望早日统一。

明朝政府疲于应战，于明嘉靖间曾一度关闭嘉峪关，断绝贡道，采取闭关政策。虽然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断绝，但丝绸之路却因此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随着不断完善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而发展起来的海上交通。

丝绸之路虽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和古迹。欣赏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址、古代建筑、陵墓石刻和寺院庙宇，如同走在山阴道上，名山胜迹应接不暇。当你仔细抚摸着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象，静静地欣赏精美的敦煌壁画的时候，当你在高昌故城穿街走巷，穿堂入室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连声赞叹。我们的先辈艺术家——古代雕刻家、画工和建筑师以何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表现力，创造出这许多人类的历史奇迹！正是他们，使丝绸之路留下如此鲜明、清晰而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些艺术品中。他们留在其中的只是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他们留给后世的是用生命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人类的后代，今天我们又能为人民美好的生活做点什么呢？希望从这本画册中，你能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注释：

〔1〕〔2〕〔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4〕 普林尼，罗马人，生于公元23年，死于公元79年，著有《博物志》等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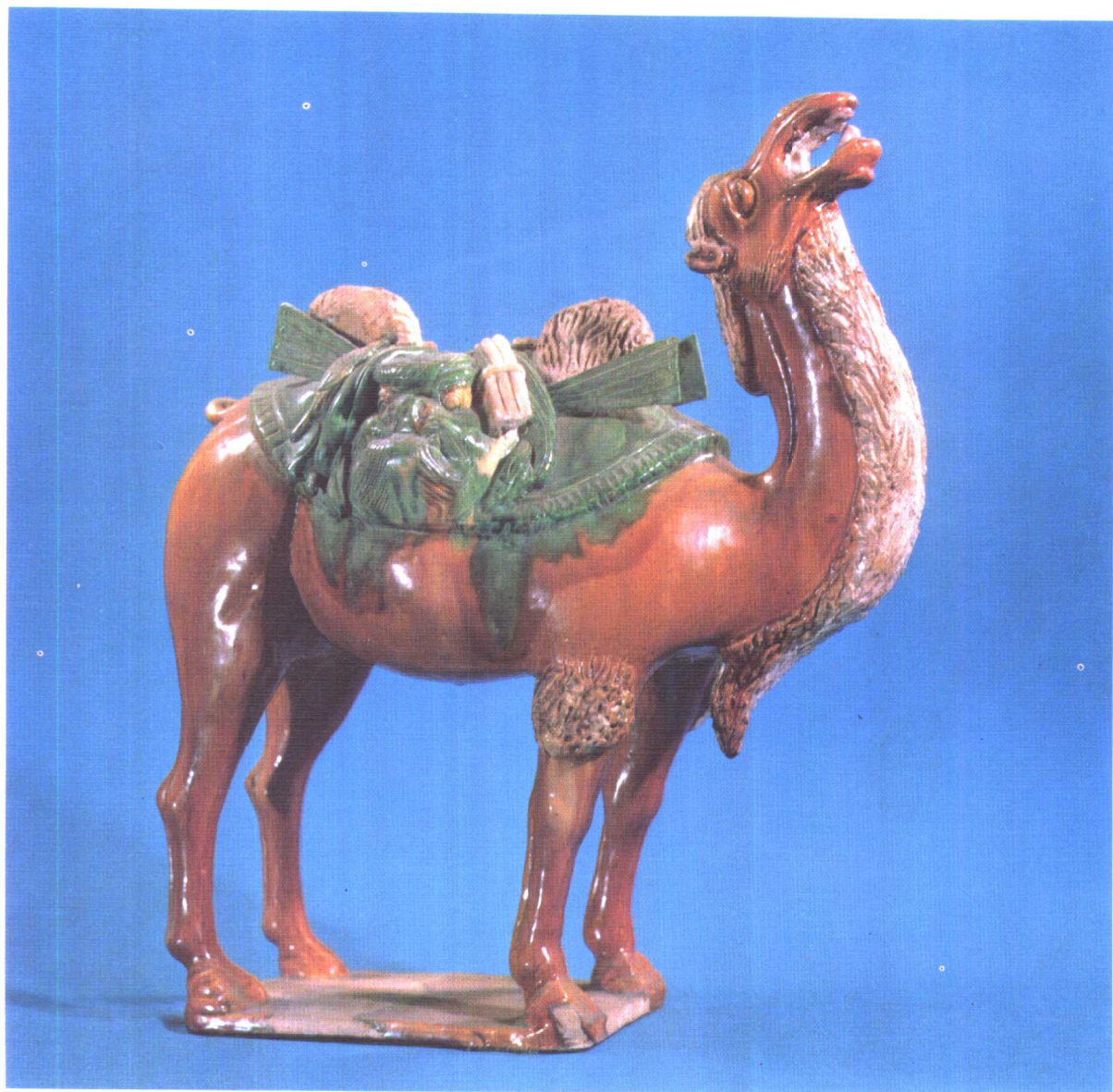
〔5〕〔6〕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7〕 狄雅科夫等著，日知译《古代世界史》第二编。

〔8〕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一期。

〔9〕〔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

〔10〕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



1 西安出土唐三彩运丝骆驼俑